

李克灵《爷爷奶奶们的青春岁月》

在苦难中彰显人性的光辉

□封秋昌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奋斗史。没有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20世纪60年代，神州大地经历了史所罕见的大饥荒，俗称“三年自然灾害”。“民以食为天”，而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饥饿，这样的饥饿状态，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后辈们所难以想象的。如今成了爷爷奶奶们的一代人，当年正是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李克灵的长篇小说《爷爷奶奶们的青春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所描写的，就是杨腾、雪火、柳竹等安济一中的这些学子们是如何对待饥饿，如何在饥饿中坚持生活和学习的奋斗历程。

在苦难中彰显真善美的人性光辉，是这部作品突出的特点。“三年自然灾害”，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文学作品理应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和解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文艺作品至今鲜有触及；而反映中学生在这个历史时段的作品，这部长篇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单就题材而言，说它是认识上的偏颇了。《爷爷奶奶们的青春岁月》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如实地描写了苦难，却不给人苦难感和悲凉感。相反，它浓墨重彩所描绘的是闪烁着真善美光辉的动人场景，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是满满的正能量，给予读者的，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所有这些，又让人感到真实不虚，而没有粉饰、拔高、虚假之虞。

其二，展现物质上贫困、精神上富有的时代风貌。这部长篇以安济一中为轴心，通过主人公杨腾的活动轨迹，将笔触

伸向了偏僻的山村、县城、省会、北京；笔下的人物不仅有性格各异的学生，还有农民、中小学教师、大学校长、专家、教授、县长、厅长、省长和省委书记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和角角落落几乎都涉及到了，开阔的艺术视野，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让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所中学，而是那个时代整体性的社会风貌。那是一个物质上极度贫困的时代，也是一个上下一心、不怕困难、意气风发、团结奋进的时代。在极度的饥饿面前，各级干部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关心民众，不搞特殊；数学老师安昌，晕倒在讲台上，硬是躺在行军床上坚持把课讲完；粮食定量从5两减到3两，人人浮肿，女生却主动自觉地支援男生粮票；杨腾的大姐，冒着风雪严寒，步行往返400多里山路，把家里省出来的由分分角角凑起来的两元钱给杨腾送到学校。我们看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单纯，彼此相互关爱，其友情、亲情、互帮互助的场景，随处可见，感人肺腑。其中，女班长柳竹和钟老师为杨腾、雪火“雪中烤被”的描写，很是精彩，真情厚谊蕴含其中，把男女有别不好明言的微妙心理写得细致入微，令人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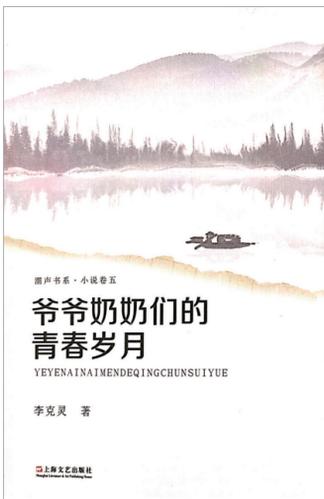
其三，塑造了数学奇才杨腾这个人物形象。杨腾出生在偏远闭塞的深山区，姊妹7个，家徒四壁。在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他读小学时就自学完了中学数学；上初中一年级时，只有13岁的杨腾，被破格允许参加全国高中数学比赛，并获得第一名；后来被邀请参加世界数学大会，其论文被世界数学权威刊物采用。杨腾这个人物，并非纯然虚构，而是在几个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对于杨腾这个数学“奇才”，作者并没有把他神奇化，作品的着力点在于寻觅、探究其中的“为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数学天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没有被埋没？从杨腾自身来说，除了有数学天赋外，他从3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练太极拳，严格的训练和雷打不动的坚持，使他不

仅练就一身武功，也造就了他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挑战自我、坚忍不拔、愈挫愈勇的坚毅性格。

杨腾的数学天赋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杨腾遇到了那么多诚心诚意帮助他、指导他、呵护他的“伯乐”们。没有小学时的王老师，他绝无可能在小学就自学了中学数学；没有安济一中的推荐，没有省地县各级领导的批准，他就没有机会破格参加全国高中数学比赛；没有万帆教授出面，他会被监考老师挡在考场之外；后来万教授还亲自指导他修改数学论文。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天才也可能被埋没，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杨腾恪守的座右铭。他武功高超，却不轻易外露；他学习成绩无人可比，却谦虚内敛。在他的内心深处，最宝贵的是这样两点：一曰“仁义”；二曰“诚信”。“仁义”，使他心地善良，宽厚待人，总是真心实意地不图回报地去帮助别人，一切需要帮助的人。雪火在他的帮助下，考上了安济一中；柳竹经过他的悉心指导，从数学不及格到跃居全年级第三名；面对困难，他冲在前面，荣誉面前，他退到后面，比如他入党名额让给了其他同学，他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父亲当选村支书后，在他的建议下，聘请原来的支书当顾问。而与人相交，见情见性，以诚相待，他与雪火的刎颈之交，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不说空话大话，而是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从不食言。此为诚信。

杨腾的这种精神品格来自何处？应该说，与他自幼习练太极拳密切相关。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如此看来，杨腾习练太极拳，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不再是单纯的习武，而是一个学习、认识、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要义的过程。因此，杨腾的精神品格和他的所言所行，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



其他人物如雪火、柳竹、钟老师等也各有特点，令人难忘。

其四，“反推式”的结构方式。这部长篇分为“现在时”和“过去时”两个时段。“现在时”写杨腾在培养教育子孙上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业绩；“过去时”写爷爷奶奶们当年的“青春岁月”。在叙述方式上，两个时段并不通过回忆、意识流等方式交叉叙述、不打破时空界限，相互切割，而是两个时段泾渭分明，自成一体；也不是按时间的先后从“过去时”写到“现在时”，而是先写“现在时”，再写“过去时”。这种结构方式也比较少见，可以称之为“反推式”结构。而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叙述者，都是杨腾的孙女杨阳（4岁到10岁左右）。“现在时”所叙述的，是杨阳亲眼看到的爷爷奶奶们，是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而爷爷奶奶们当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则是听钟老师讲述的。李克灵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结构方式？为什么采用儿童视角让杨腾的孙女（从美国回来）作为叙述者？“过去时”和“现在时”之所以各自独立、互不交叉，因为那种“没饭吃”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远去的历史，爷爷奶奶们的精神财富则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让杨阳作为探索者、谛听者和叙述者，既能把两个不同时代连结起来，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陈德民《红杉树下》

穿越两个时代的一段“民族秘史”

□李惊涛

江苏作家陈德民长篇小说《红杉树下》新近颇获好评，令我心生温暖，原因在于作者是我相识35年的朋友，且这部作品所写的题材我很熟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调回故乡文联工作，因为文学的缘分，不久即结识了陈德民。当时他与我一样，正值韶华，怀揣梦想，与同道在中国东部一座沿海城市创建了一个文学社团。他是骨干之一，发表观点时目光炯炯，谈论见解时掷地有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知青文学”题材的突破

“知青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在当代有清晰的脉络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甚至造成了某种思维范式，即痛苦与反思。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当。但是，如果这成了“知青文学”唯一的维度或尺度，那就值得商榷。陈德民的《红杉树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于习见的“知青文学”趋同的文学现象构成了突破。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郑东杰和文澜，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代胸怀大志的中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来到苏北农村，自觉磨砺意志，吃百姓都在吃的苦，做农民都在做的活；并且在艰难困苦中不坠青云之志，躬耕田垄，改造山河，“为农献粟”，在农村发挥了“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

郑东杰曾对女儿文晓彤说：“在插队期间，要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主要就是学习了他们的勤劳、质朴的为人之本。但更多的是我们奉献了青春、才华和智慧。三队因为我们的到来，改进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产量明显增长……”这也是一种真实，而且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如果始终在文学表现领域被屏蔽，则有可能造成文学对于历史表达的缺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挺过了峥嵘岁月的艰困的人，如意志坚定的主人公郑东杰，即使社会施加在自己身上很多不公，包括“被罢课”“被下放”“被下岗”……却依然认为“人总要活得坚强一些，人生才有意义”。正是这样的人，才会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投身商海”成为“弄潮儿”，并不忘初心，投入亿元巨资在当年插队的山村全方位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实现小说主人公当初的共同愿望和人生价值，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里面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强者恒强。在我的理解与认知中，作者从故乡出发进入都市创建书局的心路历程，与郑东杰基本暗合。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会在《红杉树下》的扉页上题写巴尔扎克那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在作品中对于“知青一代”“民族秘史”的编码，选择的正是郑东杰



与文澜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塑造了具有文学新意的“知青”形象

通读作品可以认定，男女主人公郑东杰与文澜虽然承担了一代“知青”的“秘史”编码任务，但作家无意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恰恰相反，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热血青年，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在“夏收复种的紧要关头”让“烦恼缠身”，也会欠下“青春孽债”……陈德民写“知青”、写他们的父母、写农民、写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甚至写一个公安助理，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把他观察到的、体验到的、思考和理解到的人物，按照符合时代与社会制约的深度来写，以体现出他们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这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大礼敬。我们尊重它，因为如果作家笔下塑造的人物超越了“时代局限性”，那他塑造的一定不是人，而是神。有“时代局限性”的人，才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形象。

事实上，《红杉树下》令人深思的地方还在于，它所揭示的郑东杰与文澜所表征的一代“知青”的悲欢离合，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陈德民至少为读者安排了三个观察与思考的维度：一是变化中的时代形成的社会机理所致，如郑东杰回城后四个月，文澜因父母平反也得以回城；二是缘于人性复杂的渊数构成的诱因，如文澜在郑东杰回城后，“在东山大队接连遭受工作、情感和精神的三重打击，万念俱灰”，误以为郑东杰“回城变心了”；而郑东杰知道

有缘与涛声先生相识，近水楼台，也拜读过涛声先生的许多作品。印象中，已是耄耋之年的涛声先生和许多优秀作家一样，宿命般地自发且自觉地继承着鲁迅的创作精神，关注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注着民生与人性，与假恶丑势不两立，与真善美相依为命，以笔为枪，丹心铸剑，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所以，读到涛声先生的小小说新作，我的感觉是既自然又充满期待。

涛声先生的小小说三题《古玉》《古砚》《古盘》，属于那种一目了然的作品，也属于经得住细嚼慢咽的作品。出现在三部作品中的主要道具，古玉是真，古砚一真一假，而古盘是假。真假之辨，便是涛声先生这样的老作家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之一。换言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眼里揉不得沙子。对于文物收藏者来说，真假是可以而且必然用交易价值即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作品主人公舒老来说，真假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而情感更容不得假品的玷污。

舒老才是真正经得住细嚼慢咽的作品魂魄所在。舒老年逾七旬，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他手中的古玉、古砚和古盘，都是来自文友的馈赠，都蕴含着一段文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美好记忆。古语云：君子如玉；宝剑赠壮士，红粉送佳人。文友的馈赠，自然而然地隐喻着对于受赠人道德文章的赞誉与认可。拥有它们的时候，舒老曾经为它们的交易价值惊讶过，但从来只是将它们视为身外之物，从来珍视的只是它们承载的友情分量。现在将文友的馈赠再回赠给文友，这便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断舍离，而是一段旧情的重温，一种人生的意趣，一腔诚挚的情怀。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心不古，说的是人心不如古时候厚厚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叫做士风日下，说的是读书人风气一天天地坏。舒老一辈子读书写作，他便是要以自己的读书人行为方式，与现实进行抗争，哪怕是孤军奋战式的抗争。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舒老还礼，他还有所期待吗？有的。将价值不菲的古玉还给朋友，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应，舒老心里曾隐隐不适。将一真一假的古砚还给朋友，与朋友敞开心胸一番议论，舒老感觉轻松了，洒脱了。而将假的古盘还给朋友，看到久病不起的朋友那般坦诚自责，舒老深受震动，将朋友写下的那两个歪歪斜斜的字视为珍宝。舒老期待的，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以及对于自我心灵的认知。正所谓求仁得仁，反观自己的“隐隐不适”，他“觉得自己灵魂还有瑕疵，心生惭愧”；反观自己的轻松、洒脱，他觉出自己“求真，还缺了点破茧而出的勇气”；而珍藏起朋友那两个歪歪斜斜的字，是他无比珍视那莲花般洁白晶莹的灵魂。这真是一个可爱至极的老人，灵魂中的一点“隐隐”也让他心生惭愧，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舒老还礼的收获又何其多也！

涛声先生创作中不仅有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问世，还有笔力不俗的书法、绘画作品广为人知。他的《古玉》《古砚》《古盘》小小说三题，取材独到、人物独特、文字洗练、意蕴高古，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尽显小小说文体的魅力。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思维和笔力，刻画出一代读书人的形象，传递一种向善向美的良好情怀，作家倾心关注的还是世道人心，涛声先生的“涛声依旧”，真正令人赞叹不已。

涛声依旧

□丁临一

——读陆涛声小小说三题

宇桥《紫云英》

笙歌幸福记流年

□徐子芳

认识宇桥虽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在一念之间与其相见；必然是彼此初心相通，多有共识。所谓一念之间，是应家荣兄相邀，欣然前往，与宇桥先生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讲起合肥化工事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论人说事率性坦言，妙语连珠；谈古论今博闻强记，诙谐幽默；与人相处掏心掏肺，平易近人。那次，我现场看到改制重组的中盐红四方新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后来在采访中得知，合肥化工企业由地方部队列入国家级“王牌”部队，它激情燃烧的历史，与宇桥和他的团队有着“生死相许”的牵手，才有了今天的新生。也是在那次初见时，深感宇桥对文学的爱好，其造诣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但那次我并不知道，在他投身国有企业建设将近40年的岁月中，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记录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这为他后来写作长篇叙事散文《紫云英》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紫云英》洋洋洒洒近50万字，从文体上看，它不是纯粹的作家笔下的散文，很少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讲述自己与所在企业改革开放的变迁史，有很强的记录性、史实感。从企业破产到拯救、从改制到重生，宇桥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一次挑战，都是一次破茧。他都能奉献储备、获得感悟、赢得赞誉。他是在现实和理想、个人与时代、坚守与远眺中跳舞，从而生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因为这样，才没有削弱散文叙事的功能，相反却强化了真实的力量。文本走的是忠于史实的路径，摒弃虚构，做到事有依据，人人是原型，句句有出处。这种《史记》式的写作范式，更能直接表达作者的主观情绪、思维模式，从客观形象抵达达到抽象的深度，这是需要有笔力的。全书46篇独立成章的故事，一环紧扣一环，既错落有致又前后呼应，内容丰富开阔，情节曲折跌宕，语言犀利，在《紫云英》预设的语境中，会跟着作者一起时而忧思、时而热烈、时而疑惑、时而击节……在每个字里行间，宇桥不想藏掖什么，而是坦陈胸臆、直言大义，触目可见思想指向的锋芒。真实细致的场景下的时空，激荡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厚气息，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清晰维度，从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感染力。

宇桥自1996年走上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他和他的团队一次次临危受命，先后去过安徽省江淮磷矿、江淮化肥总厂、定远化肥厂、安徽氯碱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让已破产倒闭或濒临倒闭边缘的企业起死回生。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又万里奔波、历尽艰辛、四海招商，几经艰难的努力，将合肥国有化工企业整体带上正确的轨道。宇桥和他的团队亲手制定了一系列“护法法则”，以保证企业管理安全运行和改革不致错位。国有企业这条关系国家经济兴亡的大命脉，在他身边不断上演生死存亡。宇桥将这时光在他笔下过滤，得到提纯，得到净化，从而变得更加明亮。

在《紫云英》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企业改制的重要节点上，宇桥挺身而出，为维护企业的每一个职工的“饭碗”而焦虑，但是，他却出人意料地让妻子下岗了。这时，好心人提醒他说，别傻了，企业破产，大势所趋，趁天时把它“卖”掉“买”下，变更到自己名下。以你的才能和智慧，不用三五年时间，你就是富甲一方的老板。宇桥笑着说，我还是从宇桥乡村走出来的小五子宇桥吗？

宇桥是繁忙的。他必须超负荷地工作，只有敬业才能有担当。少年时代的文学之梦，无论工作怎样沉重和繁忙，他始终不能忘怀。他只能在纷繁落幕的深夜写作，难得的一点“静好”，提起笔，从寂静的夜色出发，穿梭于往事的喧嚣和落寞之中，行走在红尘与梦境之上。字里行间燃烧着激情的火焰，既照亮了自己的心扉，也迎来了厂区黎明的曙光。

宇桥不是专业作家，他心里明白，写出来不是功利，只是自觉，故能清醒为之，用心为之。他讲的是自己的经历、企业的故事，敞开来看，就是中国式的故事。这是他库存已久的资源，一直活在我心中，可谓得天独厚。宇桥是有心人，不仅完好地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培植成文学的花枝，就像是他成天与之打交道的化学分子，经过合理的化工程序，变成成为人类服务的产品。宇桥把这些枝叶连缀起来，就是一棵风景优美的大树，绽放出瑰丽无比的历史芳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历史中的一个精彩篇章，一出大剧中隽永的折子戏。

自古至今，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是为道而文，为史而写，才有高格。读《紫云英》，有铁马金戈的雄壮，荡气回肠的力度。宇桥发端于身边的小史，写出的是大情怀，藏纳的是大智慧。这是他对文学的修为，也是他的诗心，敞开来的就是胸襟。如此而已，并有诗为证：“别道乾坤正变迁，云英五色已粲然。千家岁月青云日，八阵图谋沧海篇。风雨芳华开笑目，笙歌幸福记流年。诗书不是无情物，志在四方结善缘。”